



杀回武汉

孙勇

陈总,武汉一家民营教育机构创始人,我多年的好朋友。因公司业务发展迅猛,上个月,陈总准备在武汉市购买一家铺面,作为新的培训网点,为此凑足400万元首付款。恰逢光谷一家中意的新楼盘开盘,陈总便携款前往,不料现场买家云集,一些好的楼层瞬间被抢购一空,400万元活生生砸在他腰包里无机会出手!扩张网店的计划由此搁置,陈总决定观望一段时间再定夺。

当陈总在电话里将这件事告诉我时,他苦笑,我惊讶。没想到作为二线城市的武汉,其新楼盘销售竟然火爆

到这个程度!

我在武汉读书生活多年,那时,武汉的楼市一直不温不火,均价长期在3000元左右徘徊。2006年以后,武汉的房价缓慢上升,最近三年,升幅加大,目前均价已达到12000元,中心地段的均价逼近两万元。

我原本有在武汉买一套小房子的计划,但看到武汉楼市眼下涨得如此凶猛,只好当起了袖手旁观派。

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有趣:我袖手,他人出手,而且出手的人络绎不绝。随口一说就有两例。

阿英,我的武汉大学校友,原为深圳媒体从业者,为深圳高房价所苦,加上看好“大武汉”的发展前景,去年毅然从报社辞职,杀回武汉。目前,她在武汉一家研究机构上班,在当地按揭买了房子,日子据说过得不错。

大买家,一出手就是半层楼、十几套地买,几千万的购房款一次搞定,尤其是光谷一带,新推的几个楼盘瞬间售罄,持币200万元以下的购房者只能算是小散,售楼小姐们甚至顾不上搭理他们。

有市场人士认为,武汉楼市中这些陡然增加的大买家们,主要是从北上广深杀回的投资客。

2008年金融危机告一段落后,武汉大胆调整发展战略,斥资数万亿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开通地铁,改造城中村,兴建大型商贸综合体,火热招商引资,意在打造一个“大武汉”,冲进一线城市行列。最近5年,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战略,在武汉被运用到极致,最火热的时候,武汉有一万多个工地同时开

工,市长阮成发因此被民间戏称为“满城挖”。这种战略虽然备受争议,但收效明显。武汉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逐年上升,“大武汉”初具轮廓。

如果说,十年前武汉人的心态有些自卑,那么最近两年,武汉人可谓信心满满,很是有些自豪感。”在电话中,陈总这样告诉我。不过,他也承认,对于武汉近期楼市的疯涨,他也看不懂,他觉得武汉目前的房价,可能提前透支了未来多年的利好。

他看不懂,我也看不懂。在我们两人观望的时候,正有无数购房客前赴后继地杀入武汉楼市。到底谁聪明,谁是傻瓜?只有等时间给出答案。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钓鱼、蝌蚪与横幅

马虹玫

集约化生产方式带给人类集约化居住方式。从荒郊野岭到繁华都市,从石墙茅屋到钢筋混凝土,热闹的同时,自然的山川水木、柳绿花红、虫鸣鸟叫,离我们越来越远。可人类毕竟是地球子民,汽车、大厦、手机等这些现代文明并无法完全满足我们的日常需要——在精神愉悦方面的需求。人类基因中深藏着唯恐被自然抛弃的焦虑感,这促使人类在居所中引进自然:“看吧上帝,我们和自然的关系好着呢!”

深圳常见一些巨无霸大型社区。通常坐落于原关外地区。地理位置无法改变,要想引来置业的“金凤凰”,开发商在小区内部配套上动心思使手段。香樟成林、秋枫红叶、大叶榕悬挂着长长的胡须;鸡蛋花洁白、勒杜鹃红

艳;大王椰高挺,墙角屋檐爬满藤蔓,凌霄花攀援;芳草依依,野花在春风中摇曳。人工湖波光潋滟,水草植物,争奇斗艳。天人合一具体而微,既帮助开发商提高销售额与销售速度,也让业主享受良好环境,对于置业关外的不甘心理,略作补偿。

如此美景怎能不凸显“管理”的重要?社区党委、工作站、某协会、业委会等各色组织,擅长以大红条幅刷出自己的存在感,以图宣传与教化之责。政府补贴的社区建设费用,被以上各种自治、自治部门用来制作、悬挂横幅。常见款式有“某某是我家,垃圾不落地,我们更爱它”等等。俨然业主代言,仿佛直抒胸臆。上级考察可得高分,而普通住户觉得碍眼,原本绿意葱茏中,突然来一抹不和谐的红,上书口号表决心式语录。在视觉观感和文明旨趣方面,都不能让人产生愉悦之感。

业主缴纳管理费,物业合理使用之。在绿化方面孜孜投入和有效管理,造就“人气与绿意齐飞,春水共夕照一色”的景象。每到傍晚时分,湖边三两岁小孩儿成群结队,挪动着肥腿笨拙而执拗地往湖里撒下鱼食,引来锦鲤黑鱼翻滚争抢。鱼儿吃的太多,肥的也快,卖鱼食的老板娘也跟着生意兴隆珠圆玉润,物业乘势张罗起“钓鱼比赛”。限定使用鱼竿鱼钩,杜绝网兜。但见旌旗招展,欢声笑语,人们扶老携幼倾巢出动。有位七十有余的老太,真乃钓鱼界“梅超风”也。将一根缝衣针弯成鱼钩,寻一僻静处,一人“独钓寒江雪”。不知她使用何种手段,鱼儿成群向她涌来,一手探下去,手起钩落,旁边装鱼的桶里又多一条。很快桶就满了。超风老太淡定起身,拍拍屁股上的

灰,挥挥手,只拎走满桶的肥鱼,不带走任何一片彩云,身后倒是跟着熊孩子一帮。

准备过马路的青蛙常和宠物狗对峙,互不想让,等狗反应过来青蛙是个活物,想逗弄,青蛙已经横过马路遁入草丛。蜗牛尤其喜欢在下雨天搬迁,从A栋到B栋。孩子偶遇它们,童稚的眼睛里充满惊奇与喜悦。大雨让平素干涸的小河水涌动,蛙类家族在鹅卵石上留下自己的后代。“蝌蚪”便成为孩子们另一项愉快的游戏,孩子们分工合作,捞到蝌蚪就放入小瓶。心慈的女孩,走的时候又把捞到的蝌蚪放回小河中。打捞和收获的兴奋让孩子情不自禁,哪怕湿滑摔倒,大人孩子均不以为意。感受蝌蚪的滑腻质感,观察其摆动游弋的姿态,孩子们互相交流打捞技术……这些久违的属于上个世纪孩子们的欢乐,是再多精美镜

头和书籍都展现不出的,是活生生的自然。

千百年来,人与自然争斗不断,渐渐明白,我们和自然并不是谁压倒谁的关系。一个小区就是一个生态系统,既是人群邻里之间的社交生态系统,也构成了其间的花草、蜗牛、青蛙、小鸟、鸡鸭鱼虫、宠物猫狗等动植物界广泛联系的自然系统。置身自然才能体会人之渺小,自然是舞台是音乐,是有声有色而无言的教化。自然教化的力量远比空洞无力的语言有趣和管用。拜托各横幅爱好者们,下次上纲再拔钱,麻烦多用于环境与维护吧。养鱼种树多一点,横幅说教少一些。社区内“老有有乐、少有所乐”。宁静平和的生活环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用流行的话讲——这才是“共建和谐社会”。

(作者系深圳自由撰稿人)

皮囊之累

木木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也有什么科学意义上的学问最终有可能走向玄学(或者说宗教也可以),宇宙学应该能算得上一个。据说,当年牛顿先生就很困惑于行星围绕恒星和谐运转的温馨剧是由谁宣布开始的,于是

思想想去,一个“金智的主宰”便出现了。也是,过于完美的场面,总会让人产生一些不真实的感觉,为了不使大脑抽筋儿,就需要一个全能的主宰来救场。

对头顶上宇宙的困惑,并非始于牛顿,也不会终于牛顿;就此而言,配得上这个号称“永恒”的宇宙的,也只能是人类“永恒”的困惑了。如此匹配,很搭。旧困惑去了,总会有新困惑

接班,绵延不绝,是谓“永恒”。当牛顿先生的“完美行星”困惑终于解决(就算解决了吧)之后,黑洞之类的困惑就立即填补进人类刚刚闲下来的大脑。

说到黑洞,当然就不能不提到霍金先生。不久前,霍金先生刚刚在中国开通了微博,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霍金先生写过一部科普著作——《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这本探讨宇宙起源和归宿以及黑洞学问的科普著作,被译成了40多种文字,印数超过1000万册。不过,这部科普读物的内容却过于艰深,大多数人估计都是看看热闹,以致有人戏称这是一本“读不来的畅销书”。明明“读不来”,却能风行天下,有人说,这是因为霍金在此书里“尝试解答了过去只有神学才

能触及的题材”。

你看,高深的宇宙学,和神学终于就这样发生了“联系”。霍金先生的科普读物得到了《圣经》的待遇,也不难理解。人类的灵魂,似乎也只有在困惑破除之后,才能赢得安宁;灵魂安宁了,身体也才能随之安静下来,摆脱张牙舞爪的日子。不过,霍金的科普读物,估计法力尚不够强大,显然还难以让人寻得归宿,因为其所描述的宇宙、黑洞验证起来,大约同寻找上帝的所在同样困难。

难在哪儿呢?人的身体——对了!就是这身臭皮囊——宿命性地禁锢住了人类对“终极”的认识。正如一只陶醉于完美二维世界的小蚂蚁,又怎么理解得了人类在四维世界里的困惑呢?于人类而言,有这身臭皮囊拖累

着,别管是黑洞还是白洞,真的就只能是那个永难回归的“伊甸园”;虽然“思想”可以在园子周围貌似自由自在地飘荡,但肉身却注定永被牢牢禁锢于宇宙之中的一粒尘埃之上。

因此,那些在“伊甸园”附近飘来荡去的自由的“灵魂”们,于无比珍爱这身臭皮囊以致难舍难弃的人而言,似乎意义就不大;于默默无言的宇宙或者黑洞、白洞而言,就更无任何意义。不过,或许等到有人灵魂出窍的那一刻,霍金先生的玄妙理论倒真的能焕发出玄妙无比的光芒,彼时彼刻,没准儿宇宙间一切奥秘的“标准答案”都会不请自来呢。但好不容易脱离了臭皮囊束缚的灵魂,大约马上就没了与“臭皮囊”沟通的兴趣——根本不在同一个维度,沟通也真是多余。因此,人

也就只能宿命地继续困惑下去吧。

受这副皮囊之累,大约人类就难以实现跨越自身所处维度的思考,这或许也是人类一切困惑的根源。虽然霍金所受皮囊之累比绝大多数人都要轻些,以致他的思想相应地轻灵了许多,可以思考“伊甸园”是否深陷在深井里之类的问题,但其终究没有彻底摆脱束缚,因此,他所描述的黑洞,仍旧只能是“他”的黑洞,与我的黑洞,或者其他什么人的黑洞,没一点儿干系。

不过,也没关系,多数时候,即使如“伊甸园”般的终极困惑,于人类而言,也属于享受的范畴——皮囊的享受,更遑论其他了。明白了这一点,人世间的许多事,其实倒简单得多。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城市化中的异乡人

田田

单位组织去阿拉善植树,我把随手拍的巴彦浩特镇马路上的照片发给朋友,她家就在这里。微信里回复的却是“不认得,我不熟悉的街道”。想想不禁要笑,此时的她身处南半球的澳洲,地产咨询工作要求她对悉尼某个区的所有医院、购物中心等位置了如指掌,甚至从小区开车到最近的学校几分钟,她也熟记于心。但是对于曾经16年生活的家乡,她却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个异乡人。

还记得高中时候她来到自治区的首府上学,跟我讲下雨的时候因为想念爸妈,就对着窗外哭。10多年过去了,她从小镇来到首府,在北京上大学,最后落在了跟我整整相差3个小时差的南半球。这在文学的传统命

题中,就是活生生的“外省青年”,在这个行列里的,还有《红与黑》里的于连、《高老头》里的拉斯蒂涅,甚至还有骆驼祥子。在文学史里,外省青年就是那些来自底层的、边缘地带的年轻人,他们背负着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的内心矛盾,向经济、政治中心地位发起奋斗。

可是转念想想,包括我在内的身边的人们几乎全部都是外省青年,在中国从农村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的时代潮流中,几代青年人迎来改革开放、户籍改革以及高校招生改革的政策变化,我们跟着别人毫无知觉地离开家乡,改变了自己和家族的生活,直到最后成为自己家乡最熟悉的陌生人。人口流动是城市化进程最为显性的部分,在中国,衡量一个城市经济文化水平的高低,大抵你只需要简单

地看,这里是人员输入地区还是输出地区。人们用脚投票,走出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但是,农村变城市,三五月即可高楼平地起;但人的城市化,可能要花一辈子的时间,而且快速城市化过程带给每个个体内心的挑战,却很难被量化写在任何政策文件中。我的很多同学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定居,在一个典型的小家庭中,也许她来自河南,他来自浙江,而他们的孩子将是一个北京人。千万这样的小家庭代表了千万家庭的断代史,每个家庭成员只拥有生命前二十几年的地域史,紧接着他们的生活便坐着火车和飞机,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就像被抛向湖心的石子,雀跃后水纹散开,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个北京出生的孩子成长着,没有机会仰望妈妈头顶铁青的天,也

闻不到爸爸屋外金黄的稻香。

也许个体归属感还只是一个矫情的非分之想,在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中,大面积频繁的人员流动,被看作会带来骇人的社会影响。由于教育制度不合理,加上市场经济缺乏自发纠正收入不平等的机制,社会的流动性就会增加,人们必须走出去寻求一份更为体面的工作。他认为,流动性会成为固化特权利益的工具,人才出走后,小镇的执掌者可能会是拥有更多财富的特权阶级。一句话就是“富的更富,穷的更穷”。

也许皮凯蒂的论调过于宿命,我们也没有文学作品里戏剧化的生活,但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给每一个青年人带来重新选择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精神上的抉择。我认得一个山东的打工女孩,她曾在北京学院路的各大

院校当过保安,却像《革命之路》中弗兰克夫妇对巴黎心怀执念一样,对云南有着迷信般的狂热。她坚持认为去云南生活是自己一生的追求,她从图书馆借来小册子,背上每一篇关于云南的讲解文章,甚至留下学生扔掉的快递箱,只因为那是从云南寄来的。而最终她去过了云南,现在在深圳的工厂里往流水线上的电视机后面贴标签。

我的朋友——来自阿拉善的小镇青年,尽管身在澳洲,还是会在某一个瞬间闻到阿拉善的味道,看到阿拉善的颜色。而我总是做着同一个梦,刺耳的下课铃声出其不意地响起来,我急急忙忙穿过整个走廊,一转身,眼前正是小学的操场,地上的沙砾砾可见,天上阳光正好。

(作者系资本市场研究人士)



【第三只眼】
我们跟着别人毫无知觉地离开家乡,改变了自己的和家族的生活,最后成为了自己家乡最熟悉的陌生人。